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成都学院「中国语言文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惟蜀有才

——宋代四川人才辈出的文化机理

谭平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谭平著

平

著

惟蜀有才

——宋代四川人才辈出的文化机理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 鑫
责任校对:王振漶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惟蜀有才:宋代四川人才辈出的文化机理 / 谭平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614-6534-9
I. ①惟… II. ①谭… III. ①文化史—研究—四川省
—宋代 IV. ①K2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2588 号

书名 惟蜀有才——宋代四川人才辈出的文化机理

著 者 谭 平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6534-9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2.75
字 数 36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选题依据.....	(2)
第二节 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	(7)
第二章 赵匡胤给宋代奠基的国家轴心文化	(73)
第一节 高度佑文.....	(74)
第二节 读史重史.....	(81)
第三节 分享江山.....	(86)
第四节 慎刑用赦.....	(94)
第五节 宴射生活.....	(97)
第六节 宁人勿神.....	(101)
第七节 治世向儒.....	(117)
第八节 选贤举能.....	(127)
第九节 体恤边远.....	(136)
第十节 坚定诛贪.....	(140)
第三章 宋太宗与宋代皇家教育	(147)
第一节 太祖时期皇家教育情况.....	(148)
第二节 太宗是宋代皇家教育的奠基者.....	(150)
第三节 太宗皇家教育之成效——只以真宗为例.....	(166)
第四节 “三范”与宋代皇家教育的良性互动.....	(180)

目
录

001

第四章 国家气质展示的重要平台

——以皇帝为中心的聚会 (197)

第五章 宋代政治中的后妃与川籍士大夫 (226)

第六章 宋代何以伯乐辈出

——宋太祖、宋太宗时期用人观念与用人形势的变化过程 (246)

第七章 从乱到治

——宋代对四川统治理念的定型 (283)

第八章 苏轼、苏辙对国家文化和信息安全的谋划 (324)

第一节 事情的起因、过程 (324)

第二节 苏轼、苏辙兄弟的思考、谋划与建议的价值 (333)

第三节 历史内涵分析 (337)

第九章 苏轼对金皇室和官员士大夫的特殊影响 (341)

第一节 宋与辽、金、蒙古（元）的关系及四川影响力
的提升 (341)

第二节 苏轼对金皇室和官员士大夫的特殊影响 (346)

第三节 苏轼对金皇室和士大夫发生影响的主要形式 (349)

第四节 “苏学盛于北”的力量源泉 (354)

第十章 宋代对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特殊敬重 (364)

第十一章 “多难兴邦”视野下蜀学领袖的品格 (387)

第一节 频繁天灾人祸下宋朝君臣的反应模式 (387)

第二节 伟大文豪为民请命，忠君爱民感动天地 (393)

后记 (403)

第一章 绪言：研究综述

自古以来，在涵容了众多族群、自然条件与人文生态丰富多样、疆域辽阔基础上形成，并经历众多磨难，但始终能够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其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从未改变。国家轴心文化与各地域文化之间，无时无刻与经济、政治（包含其特殊形式战争与外交）、教育、学术、艺术乃至婚姻、人口迁移等平台或管道发生着各种联系、融汇、激荡、碰撞，这种或紧张或松弛，或冲突或和谐的文化关联与某一王朝某个地域人才盛衰的关系，在学术界始终缺乏系统而有深度的个案研究，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或四川人才盛衰的规律，清晰解读诸如“为什么在宋代四川特别人才辈出”（而非其他朝代）的主题方面，留下许多待解之谜。作为一个四川人，笔者很希望在此问题上做出一些探索，给出一些答案，于是立足多年的积淀，在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重点立项资助和成都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建设资金的资助下，开展研究并撰写了本书。鉴于笔者水平有限，欢迎读者指正。

第一节 选题依据

一、本课题领域研究的概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涉及四川古代（特别是宋代）人才及其成就，宋代四川地域文化与人才关系的个案或某一领域文化与人才的互动关系，宋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对四川某个著名人物取得成就提供的历史背景、条件的研究论著宏富。影响较大的专著有胡昭曦先生的《宋代蜀学研究》《四川书院史》，蔡方鹿先生的《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魏了翁评传》《宋代四川理学研究》，张邦纬先生的《婚姻与社会·宋代》《宋代皇亲与政治》《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刘复生先生的《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的标志性成果“巴蜀文化系列丛书”，四川大学古籍所影响日增的“儒藏”学术丛书，西华大学和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举办之“蜀学研究中心”的多期《蜀学》论文专辑；邓经武教授《大盆地生命的记忆——巴蜀文化与文学》，陈世松先生的《天下四川人》等；论文中比较著名的如张邦纬先生的《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刘复生《北宋“党争”与儒学复兴运动的演化》等；特别是近年段渝先生立足于比较文化而撰写的《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天下治乱”与治蜀》《巴蜀文化与汉晋文明》，中国社科院孟世凯先生的《巴蜀与其他区域文明研究比较》等，都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10 年 3 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贾大全、陈世松先生主编，集合众多四川史研究的重量级学者撰写的《四川通史》（其中的五代两宋卷由贾大全先生亲自担任主编兼撰稿）；2011 年 11 月由《成都通史》编纂委员会主编，同样汇集了成都地域历史研究的众多重量级学者和后起之秀撰写的《成都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出版，其五代两宋卷由粟

品孝教授等著），堪称当下四川、成都历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以上治著在对四川、成都历史的宏阔、系统叙述、阐释中，对宋代四川的文化、教育、人才等问题也有论述，对本课题的研究也多有启迪。总之，前辈、同行们从不同的视角、点、面研究论述了宋朝的国家文化，四川地域文化，四川籍人才的经历、贡献、地位等。但与本课题的研究视野、方法、观点重叠的论著尚未发现。

《四川通史》的“五代两宋”卷在第5章第1节“宋初四川人民的反宋斗争”的结尾指出：“北宋朝廷认识到要巩固在四川的统治，必须依靠和团结四川的地方势力。……改变了宋初排斥、歧视四川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开始注意联合和启用四川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共同治理四川。四川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经过这次农民起义的打击，也认识到只有依靠北宋王朝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改变了不乐仕进的态度，积极地入仕做官。宋代成为四川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①这些见解自然不无道理，但细究失之偏颇，一是没有摆脱仅仅从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陈旧视角讨论问题，二是把“人才”仅仅定义为入仕的那一部分人群。该著在同一章的第2节“北宋中后期的四川政局”中总结说：“蜀中政治由乱而治是宋代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是宋代四川经济、文化、科技发达，居于全国前列的根本原因，是四川能在南宋长期独立坚持西线抗金、抗蒙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是宋代成为四川历代发展高潮之一的根本原因。”^②这一说法也肯定没错，但失之简单。其实，就人才问题来讲，此结论只说出了每一个朝代都适用的共性因素，而没有触及纵向历史比较中的个性因素——这就是宋代四川的地域文化和王朝轴心文化出现了一个互动、耦合的最佳状态，由此构建了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并建功立业的辽阔舞台，本书认为，这个因素才是认

^① 贾大全、陈世松：《四川通史》之“五代两宋卷”第9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② 贾大全、陈世松：《四川通史》之“五代两宋卷”，第10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识宋代四川人才现象的关键所在。

二、本课题研究的意义

以新的研究思路和路径揭示古代四川人才盛衰的规律；进一步厘清古代王朝文化与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以巴蜀文化为例）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动所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对四川历史上出现一个人才鼎盛期的因果关系。

三、本课题研究的创新、突破

对于版图辽阔、文化多元一体的古代中国来讲，一个特定地域人才的盛衰与王朝轴心文化同地域文化碰撞交融所营造的历史舞台、氛围的关系，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是值得深入探索的课题。因此，本课题主要论述由于巴蜀文化个性与赵宋王朝气质的特殊契合，使得宋代（尤其是北宋）四川人才辈出，并通过他们的活动与成就凸显四川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从一个特殊视角揭示巴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国家文明互动的内在关系与制约因素。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知成都府时，曾经刊刻过《华阳国志》。在其撰写的序言中，曾专门论述史书记载的巴蜀人才数量有一个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悬殊盛衰：“自先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亦可谓众矣。复自晋初至于周显德，仅七百岁，而史所纪者无几人。忠魂义骨与尘埃野马同没于丘原者盖亦多矣，岂不重可叹息哉！”虽然此处强调的是历史记载缺漏的遗憾，但是两大时期的一盛一衰是毋庸回避的。而宋朝无疑是古代巴蜀人文及其人才最鼎盛的时期。最新版《成都通史》在专题论述中认为：“纵观古代蜀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时期，汉晋是蜀学形成和较快发展时期，南北朝至隋唐是蜀学缓慢发展时期，宋代是蜀学的鼎盛发展时期，元明清（截至1840年前）是蜀学跌入低

谷又逐步恢复发展时期。”^①这一判断基本符合历史原貌。陈世松先生的《天下四川人》指出：“蜀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摄取着新的营养，至宋代趋于成熟定型，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就两宋比较而言，四川各种类型人才辈出、影响巨大的高潮集中在北宋中后期，因为这一阶段在巴蜀文化个性与赵宋王朝气质特别契合，这种契合有较长时间以和平为主旋律的环境下来支撑。南宋四川的人才类型有所减少，总量下降，一则因为，长期处于金朝和蒙古的严重威胁下，不管是中央政权还是四川地区官民，在被迫形成的准军事化的体制和沉重的经济、战争压抑下，环境劣化，减弱了以工商业、金融业、娱乐业、茶马贸易等为主的物质财富创造活力，文学艺术之士建构自己精神家园、创造各类精神财富的从容，王朝的气质有了一定改变（权相政治盛行，开明和公正的用人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君主素质相对更差等），加上宋元战争对南宋后期的四川造成毁灭性破坏，明显压缩了四川能够出类拔萃的人才的类型和数量，不过四川官民坚定拥戴宋代基础上的以史学、理学为主要标志的学术成就；对国家战争体制下的财政困难的巨大支撑，特别是对蒙古武装力量长期的拼死抗拒，为宋蒙战争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标志是钓鱼城之战），甚至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其中涌现的各级军事人才和忠义之士之多，就古代一个地域来讲实属罕见。总的来讲，两宋时期为四川人才辈出准备了中国历史上的最佳平台和背景，本课题研究将努力从多角度揭示其成因。

四、本课题研究的对象及写作程序

在申报本课题时，研究对象原拟包括两种大的类型：四川籍人士，在四川内外扬名天下，做出重大成就者；不管原籍何地，因为

^① 粟品孝主编：《成都通史》第四卷“五代两宋”第2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在四川生活了较长时间，受到巴蜀文化熏陶、影响，做出重大成就者。笔者在对课题资料的大量收集和仔细梳理以后，感觉宋代异地来川为官从政，栖居一段时间从事学术、文学艺术或教育事业，从事工商或科学技术工作，进行宗教活动，明显被四川地域文化改变者很罕见；有疑似者也难以断定到底是他在原籍所形成的素养起了主要作用，还是四川对他施加的影响、创造的条件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笔者决定对课题进行调整，只以生在四川，或者至少儿童、少年时代在四川度过，符合本书人才的定义者为研究对象。对他们进行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坐标，以政治家、军事家、财经专家、思想家（侧重哲学）、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艺术家、工程技术专家、医学家、宗教名人、外交家等12类人才为具体类型，进行大致的梳理、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或判断。

为了增强生动性与可读性，本书想摆脱传统的以问题、支撑材料、研究结论等为一个个论述单元的谋篇布局范式，对几大主题采用编年体式的纵向叙述为主，把历史演绎的连贯性、复杂性、多元性展示给读者，本书的结论或判断也自然在其中；辅之以几个主题相关的专题论述与典型人物生平的全景式介绍，侧重从文化碰撞、交融的角度，以宋代国家和四川地方的历史为例，揭示古代四川人才盛衰的规律。

本书对人才的定义：至少有超越普通人的一技之长，并能够为国家、社会、民众带来一定福祉或利益、资源的人；不包括虽有才干但主要损害国家、民众、他人利益，对社会的损害大于其对社会的贡献者。

五、主要引证材料及引文注释方式等

众所周知，与宋史和宋代四川历史有关的典籍汗牛充栋，极其繁富；近代以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是海量，如果要全部涉猎，逐一梳爬，并鉴别真伪，确保每一条使用的材料都完全可靠，是根本不可能的，何况本课题立项以后只有两年多时间来完成。所以只能

有重点地阅读和选择，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基本可靠。本书作者通读过《宋史》《辽史》《金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核心典籍，引证材料主要来自它们，以及当今的一些名家、专家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为了避免文字繁冗，本书对出自上述基本古籍的史料，均采用书名加卷数再加具体篇目名的注释方式；对一般读者不熟悉的著述、后人（含今人）的论著，才采用表明作者、书（论文、期刊）名、出版社、出版年、页数的注释方式。另外，注明书中提到人物和事件的背景年代，则用括号，在括号中放入其年的阿拉伯数字的方式显示。行文中尽量使用阿拉伯数字以节省篇幅。另外，所有比较独立成段的引文均用楷体。

第二节 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

一、巴蜀文化个性

1. 在宋代大部分时间里，四川盆地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更加安稳富足，形成了部分蜀人读书而不求官，而重在提高道德文化修养的现象。因此有了浓厚的慕古求实的学风。虽然自张咏治蜀以后情况有很大的改变，但四川士子部分人“不乐仕进”的局面依然存在。梁启超先生在 1922 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一文中，引用了丁文江先生当时所完成的两汉、唐、两宋、明的正史上有传者的籍贯统计表，其中四川在全国 20 个省（区）加 1 个“外族”中的数据和排名是：西汉，4 人，占全国总数的 1.92%，排第 9 名；东汉，26 人，占 5.68%，排第 5 名；唐代 9 人，仅占 0.78%，排第 12 名；北宋，93 人，占 6.36%，名列第 8 名；南宋，71 人，占 11.75%，名列第 4 名；明代，57 人，仅占 3.21%，名列第 11



名。^①这个表可以从一个局部显示宋代四川政治和文艺人才的崛起（因为在正史中进入列传的人物基本都是政治人物，再加部分政治兼文艺者），但不能涵盖本书的人才分类的类型。换言之因为“不乐仕进”之风的存在，宋代四川人才中很多并没有记入列传，即便如此，主要来自科举考试选拔和伯乐举荐的四川籍人才，其为人为官多诚朴憨直，对君主、国家、学问异常忠诚。

（1）苏洵与王安石。

赠故霸州文安县主簿、太常礼院编纂礼书苏洵光禄寺丞。所修书方奏未报而洵卒，赐其家银绢各百匹，其子殿中丞、直史馆轼辞所赐求赠官，既从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嘉佑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善之，劝洵与安石游，而安石亦愿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吊，洵独不往。作《辨奸》一篇，其文曰：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昔年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也，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

^① 洪治纲主编：《梁启超经典文存》第236~237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人情也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患，虽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之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张方平尝论洵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①

苏洵对王安石的观察、判断（或偏见）独到，而且用如此决绝的方式来表达，可见蜀士的憨直或偏激世间罕有。

（2）苏辙执政，曾否定哥哥苏轼对黄庭坚的举荐。

进士李康仲特补将仕郎，康仲之母，黄庭坚女也。始上召庭坚子相赴行在，至荆渚而死。黄氏请以其夫已命未调之官禄康仲，上特许之。仍诏余人毋得援例。朱胜非闲居录：黄庭坚，豫章人，善诗律、书法，苏轼荐入馆。仍兼史院，又荐修起居注。而苏辙方秉政，以为庭坚无行，不可。^②

苏轼、苏辙兄弟情谊之深，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古名句为证。可是，一心要报效君王、公忠体国的苏辙竟然因为对黄庭坚看法迥异，阻止了哥哥对庭坚的举荐。这就是蜀中士大夫的憨直。

（3）宋高宗（以下简称高宗）认为“大率川人多学苏轼”。

戊寅，侍御史李文会论户部员外郎勾龙庭实仕于公朝，而不知尊主之义，望罢黜，以清朝列。上曰：“可与外任，此人是川人，大率川人多学苏轼，如江西人尽学黄庭坚。”^③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08，治平三年六月壬辰。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62，绍兴三年春正月辛未。

③ 《要录》卷150，绍兴十三年十一月戊寅。

“大率川人多学苏轼”——这就是高宗心目中四川士大夫诚朴憨直且稳定延续的形象。显然，高宗感觉川籍士大夫总体上气质趋同，个性明显，且没有因为苏轼以后剧烈的政治与军事震荡而改变。此条也显示，最有资格代表宋代川籍人才个性的只能是苏轼。

(4) 宋朝柳下惠——费枢。

绍兴年间发生了一个动人而罕见的故事：

八月，乙巳，左朝散郎费枢知归州。枢，广都人，宣和初，徒步入京师，将至长安舍，旅馆主人妇美少新寡，夜就之。枢不可。问知，乃京师贩缯人女，因访其父，俾取而更嫁之。人称其清。^①

在普遍纵欲、两性关系宽松，士大夫普遍有三妻四妾，并与歌姬舞女甚至风月场中女性往还的宋代，费枢，广安人，真君子、奇人高士也，他的故事后来广为流传。我们说他是宋代的柳下惠，是因为当时士大夫放浪者众，兹举数例：

十二月……壬戌，左奉议郎仲并特降二官，坐前通判湖州与倡女通滥，为言者所劾，有司鞠寔故也。（出处同上条）

宋代官员出入秦楼楚馆、风月场所乃正常现象，仲并这因造成较恶劣影响，被言官弹劾，才被制裁，也仅仅是降二官而已。

丁亥，权尚书吏部侍郎王循友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以右正言巫伋劾其迎劳使客，所过受賂，每与娼妓亵狎故也。^②

又一文官因为寻花问柳被弹劾贬降，但依然是官场中人，并没有被清除。

实际上，宋代对官员的两性关系管理不严，甚至官员在公款吃喝中，都经常以酒肉歌舞为媒介与女性纠缠在一起，以致绍兴年间有这样的禁令：

诏诸郡守臣：“许以休务日，用妓乐于公筵，余并不许擅自借用。”仍委兼司守臣具奏，台谏觉察。侍御史汤鹏举言自开乐以来，

① 《要录》卷 155，绍兴十六年八月乙巳。

② 《要录》卷 156，绍兴十七年三月丁亥。

州县官遂有达旦之会，废事扰人，故禁之。^①

虽然大宋只有半壁江山了，但是官员们好了疮疤忘了痛——宋代相当一部分官民有娱乐至死的生活样态，官民中不少“成功人士”热衷于妓乐，彻夜狂欢，此产业也相当发达，像本次禁止的“妓乐于公筵”，就是属于有情色相伴的音乐舞蹈和酒宴吃喝。这次禁止的理由也很为众位官员着想：“达旦之会，废事扰人”，而不是这些公款放纵所丢失的士大夫高雅形象，带坏整个社会风气，耗费财富等。可此时完颜亮正在准备吞并江南。

再看被弹劾的一例：

辛亥，诏昭庆军承宣使致仕王继先令于福州居住，用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奏劾也。继先怙宠干法，富埒公室，子弟直延阁，通朝籍，姻戚党友莫非贵游。数十年间未有敢摇之者。自闻边警，日辇重宝之吴兴，为避贼计。莘老入见面奏继先十罪，大略谓：继先初系贱工，负担喝药，因奴事秦桧，入拜其妻叙为兄弟，夤缘荐引，遂得以薄术供奉。陛下盛德至仁，以显仁皇后间饵其药，特加宠爱，而继先凭恃恩宠，二十余年恣为奸恶，乃于都城广造第宅，占民居数百家，以至侵官街，塞运河，其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僭侈如此，罪一也。专用给使李彦辈数人，强夺良民妇女以为侍妾，虽有婚姻，一切不顾。镇江倡家女童，妙于歌舞，又作御前取索。至今尚在。罪二也。渊圣皇帝成丧之后，举家燕饮，令妓女舞而不歌，举手顿足谓之哑乐。罪三也。^②

杜莘老，四川青神人，宋代一流忠直监察官。王继先，医师出生，有绝技，治疗显仁皇后病有功得宠，从此骄横。便以皇帝需要为名取索妙于歌舞的倡家女童为己所奢。此条可证宋代官员出入风月色情场所普遍，将名妓中的美女以各种方式弄成妻妾多见。妓女可以被请到公私宴会上表演助兴。把这些放浪之士与费枢相比，天

① 《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未。

② 《要录》卷192，绍兴三十一年八月辛亥。

壤之别。

(5) 他们为何不以司马相如、杨雄为荣，而是与此相反。

八月，癸巳，权礼部侍郎沈该乞四川类省试合格不赴殿试人，第一等并赐进士出身，余人同出身，从之。自行在吴中，蜀士不就廷试，榜首率依第三人推恩，讲和后，稍稍来奉大对。是举类试，策问古今蜀人材盛衰之故，而德阳何耕对策，极论蜀士循道守节，无心于世，引楚相子文三仕三已之说为证，又言李固无大雅之明哲，卒陷于跋扈将军之手，议者固已少之，若相如作封禅书，盖孟子所谓逢君之恶，杨子云作美新以媚贼，又蜀人所羞道。有司定为榜首。秦桧见其州里，大恶之曰：“是敢与张德远为地耶？”会耕以后至乞推恩，桧批送礼部措置该喻，其意即言今举有试中高等之人，为见先有已降等第推恩名色，及虑御试却中底甲，往往在路，迁延日月，才候试毕，便自陈为病，趁赴不及，显属太优。桧入熟状画可，自是遂为故事。^①

此例可证，在当时四川士子的意识里，四川地域文化中“循道守节，无心于世”这种品性比较突出，他们对自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司马相如、杨雄这种曾经趋炎附势的所谓成功人士都感到羞耻。正是因为如此，加上基于张浚当初拒绝推荐他继任宰相的睚眦必报，秦桧刻意贬低四川士子，减少自军兴以来类省试对他们等次上的优待。秦桧对以张浚为代表的川籍士大夫的凶狠打压反证川籍士大夫身上禀赋着一种既忠直也超脱的特殊精神气质。

(6) 四川士大夫面对宋代一直沿袭的，自己也有份但于国家有害的特权，有以下选择。

先看宋孝宗（以下简称孝宗）革冗官：

孝宗初受禅，以官冗恩滥，议革之，欲定制百官已任子者，遇郊恩权免奏荐。开贤良科，令中外普荐，而权罢特奏名。隆兴二年秋，诏右谏议大夫王之望、右正言尹穑、殿中侍御史晁公武参酌来

^① 《要录》卷 158，绍兴十八年八月癸巳。